

康熙評傳

(下)

孟昭信 著

論君道第一 凡四十一

康熙六年

主編

匡亞明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

謹遵

聖祖躬親大政詔諭天下曰朕以冲齡

請朕承

太皇太后之命躬理萬幾惟

天地



南京大学出版社

康熙评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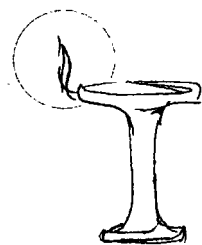
(下)

金明哲 著

中国历史人物研究丛书



南京出版社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康熙评传 (下)

孟昭信 著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熙评传/孟昭信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978 - 7 - 305 - 06052 - 6

I. 康… II. 孟… III. 康熙帝(1654 ~ 1722)—评传
IV. K827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4168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典藏版)

康熙评传

孟昭信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

网址:www.rulin.com.cn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660 × 960 1/16 印张 30.75 字数 345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6052 - 6

定价: 60.00 元(上、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名誉顾问 陆定一 谷 牧 李铁映 陈焕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王霞林

组 员 王 湛 陈万年 石启忠 韩星臣
洪银兴 冯致光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光训 丁莹如 王元化 王朝闻
冯友兰 曲钦岳 任继愈 刘导生
刘海粟 安子介 孙家正
杜维明(美国) 杨向奎 苏步青
李 侃 吴 泽 何东昌 张岱年
陈 沂 罗竹风 赵朴初 施觉怀
钱临照 徐福基 袁相碗
席 文(美国) 唐敖庆 黄辛白
蒋迪安 程千帆 谭其骧 滕 藤
戴安邦 魏荣爵

主 编 匡亚明

终审小组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孝萱 巩本栋 时惠荣 张永桃
陈 振 茅家琦 林德宏 周勋初
洪修平 蒋广学(常务) 潘富恩

第一章 崇儒重道，经世致用

——学术观点与哲学思想

一、推崇孔孟程朱，发展经世实学

康熙毕生崇儒重道，完全出于笼络汉族士大夫、掌握文化思想统治权，以巩固清政权的需要。儒学乃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帝王统治颇有裨益。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思想一直受到官方的青睐与推崇。后历经唐、宋，又形成从孔子、孟子到宋儒程颢、程颐、朱熹等历代相承的儒学道统，为各朝君臣所遵循。清朝早在康熙祖父、太宗皇太极时已开始接触儒家典籍；其父顺治帝“笃好儒术，手不释卷”。康熙大有乃父遗风，从治理国家的实际需要出发，将“崇儒重道”作为基本国策，认真推行。

康熙于八年(1669)四月十五日,亲诣太学祀孔之后,又迁就汉族士大夫要求,宣布恢复以八股文取士之旧制。^①此举对争取汉族士大夫起了重要作用,甚至有“自是以后,汉族始安,帝业始固”^②之说。

康熙为用而学。十年(1671)二月十七日肇举经筵大典于保和殿。此后每年春秋二季照例举行。同年四月初十日,首开日讲。此后,在日讲官熊赐履等人辅导下,从朱熹注的四书入手,继以《尚书》、《周易》、《诗经》和《资治通鉴纲目》,无间寒暑,孜孜问学。自己学完又将讲义刊行,鼓励臣民学习。并于十六年十二月亲制《日讲四书解义序》,进一步抬高孔子、孟子的地位和作用,将道统与治统完全统一起来,写道:“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圣贤训辞皆为万世生民而作,“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历代贤哲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③。

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他第一次南巡归途经山东曲阜,亲诣孔庙瞻仰,行三跪九叩头大礼,特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大成殿中,并决定重修孔庙,建立孔子庙碑,亲自撰写碑文。孔庙告成,康熙遣皇子前往告祭。他亲撰《告祭文》,写道:“朕惟道统与治统相维,作君与作师并重。先师孔子,德由天纵,学集大成,综千圣之心传,为万世之师表。”^④他一再将“道统”与“治统”、“作君”与“作师”并提,不仅反映二者之间互

① 康熙二年曾废除八股取士。但汉族士大夫已习惯于这种死板、生硬的八股文,认为不作八股文章,便是不讲圣贤之学,因而一再要求恢复旧制。

② 《清朝野史大观》卷三《笼络汉族之政策》。

③ 《清圣祖御制文一集》卷十九,页五至七。

④ 《清圣祖御制文二集》卷四十一,页十六至十七。



相维系的密切关系,而且也表明他本人欲学习二帝三王,集“治统”、“道统”于一身,既“作君”又“作师”,从而掌握思想学术的最高领导权。

他还将圣人加以区分:“有行道之圣,得位以绥猷;有明道之圣,立言以垂宪。”“尧舜禹汤文武,达而在上,兼君师之寄,行道之圣人也。孔子不得位,穷而在下,秉删述之权,明道之圣人也。行道者,勋业柄于一朝;明道者,教思周于万世。”^①他推崇明道之圣人,立志使自己成为“兼君师之寄”的“行道之圣人”。康熙行道之策,是大力推崇程朱理学,但又对其进行适当的改造。

儒学发展到宋代,经二程、朱熹等人进一步哲理化、系统化,形成为理学。理学的出现是经学笺注没落及佛学传入的结果。两汉盛极一时的经学,与魏晋玄学及唐时传入的佛学相比,显得过于繁琐,且思辨能力薄弱。所以宋初疑经、排经之风甚盛,儒学陷于困境。在此情况下,二程、朱熹等人以儒家思想为主,同时吸收佛学和道教的某些论点和思想方法,以研究心性、天道或天理为主,故称道学,或理学。理学中以南宋陆九渊(号象山)与明代王守仁(号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流派,强调静坐顿悟、主观修省,更与佛学禅宗相近。明初朱学占统治地位,明中叶后王阳明学说迅速发展。但到明末,其空疏学风已使人厌倦。明亡后,学术界不约而同的把亡国原因归罪于统治者的腐败与理学家的空谈误国,于是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逐渐兴起。

在陆、王心学已威信扫地情况下,康熙便大力推崇程朱理学。但他尽量将朱熹与孔孟联系起来,既尊孔又尊朱,并发扬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四十,页二十。



程朱注释与传播经书的功绩,将理学向经世致用的实学方面引导。他称赞说:“自汉以来,儒者世出,将圣人经书多般讲解,愈解而愈难解矣。至宋时,朱子辈注四书五经,发出一定不易之理,故便于后人。朱子辈有功于圣人经书者,可谓大矣。”^①为利用它作为社会统治思想,特命儒臣重修永乐时编纂的《性理大全》,并亲撰序言说:“朕惟古昔圣王所以继天立极而君师万民者,不徒在乎治法之明备,而在乎心法道法之精微也。”^②指出理学精髓心性、道法,古已有之。又在《〈日讲易经释义〉序》中写道:“朕惟帝王道法载在《六经》,而极天人、穷性命、开物前民、通变尽利,则其理莫详于《易》。”^③证明欲明理则必通经。这一论点与当时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见解相吻合。康熙又命熊赐履、李光地等“素日留心于理学者”纂辑《朱子全书》,并在序言中深有体会地说:“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又说:“朕集朱子之书,恐后世谓借朱子之书自为名者,所以朕敬述而不作,未敢自有议论。”^④表示他对保持程朱理学本色的关心。康熙于五十一年(1712)二月谕大学士等:“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钜。”^⑤于是经议准,将朱熹从配享孔庙原在东庑先

① 《康熙政要》卷十六,页二十一。

② 《清圣祖御制文一集》卷十九,页一。

③ 《清圣祖御制文一集》卷十九,页十。

④ 《清圣祖御制文四集》卷二十一,页十一至十三。

⑤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九,页八。



贤之列,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翌年九月,《朱子全书》及《四书注释》刊刻告竣,康熙降谕,令速颁行。此后又明令将朱熹所注四书,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以致形成“非朱子之传义不敢信,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社会风气。

康熙虽毕生勤奋学习儒家经典,推崇程朱理学,但并非想当理学家。因为理学家脱离实际空谈心性,容易走向偏颇。他在晚年曾深有体会地说:“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然而,“若以理学自任,必致执滞己见,所累者多。宋明季世,人好讲理学,有流入于刑名者,有流入于佛老者。……今又有自谓得道统之传者,彼此纷争,与市井之人何异?”^①他认为古书中不可凭信之处甚多,因而主张“皆宜断之以理,庶不为其所惑。读古人之书,亦当自有定见”^②。从这一原则出发,虽然他一生始终推崇与提倡程朱理学,但他对程朱理学却有着与当时理学家不甚一致的理解,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与理学并不完全相同的思想,这就是他的从实际出发、身体力行、讲求实效的务实思想。他的务实思想体现在各个方面。

二、“人之为圣贤,非生而然也”

关于认识的来源,康熙否认生而知之、皇帝才智“天授”之说,而重视学习和实践的作用。历来人们视皇帝为真龙天子,不同于凡人,是生而知之的天才。有人恭维康熙,说他的知识和才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六十六,页九。

② 《清圣祖御制文二集》卷三十八,页一。



能皆“由天授，非人力可及”。康熙听了，不以为是，反驳说：“尔等试思，虽古圣人，岂有生来即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习而成。务学必以敬慎为本。朕之学业，皆从敬慎中得来，何得谓天授，非人力也？”^①他坚信人的知识和才能并非生来就有，而必须通过学习和实践才能得到，因而，“生性好问”，不仅向著名学者询问，还经常求教于普通群众，其中包括侍卫、宦官、保姆及年长者。每次见到他们，总要提出一些问题，请予解答。他深有体会地说：“虽极粗鄙之夫，彼亦有中理之言。”^②

康熙的可贵品德尤在于，他终生牢记和感激那些普通人的旧日教诲之恩。有一次外出行围，侍卫们见他弓马娴熟，箭不虚发，都极口称赞。这使他回忆起幼年时，向侍卫阿舒默尔根学习行猎的往事，说：“朕于骑射、哨鹿行围等事，皆自幼学习。稍有未合式处，侍卫阿舒默尔根，即直奏无隐。朕于（射猎）诸事谙练者，皆阿舒默尔根之功。迄今犹念其诚实忠直，未尝忘也。”接着，他勉励侍卫们：“尔等年少，宜加勤学，凡事未有学而不能者。朕亦不过由学而能，岂生而能者乎？”^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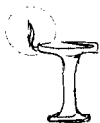
康熙勤奋读书，知识极为渊博，但并不盲从书中之言，亦不因袭陈说。他见史书所载，项羽坑秦卒20万，便问道：“夫二十万卒，岂有束手待毙之理乎？”^④古人认为塞外蒙古迁徙无常，逐水草而居，似乎无一定居处，可以任意栖止。他亲历其地，调查研究，发现蒙古也有固定居处。他分析说：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六十二，页二十、二十一。

② 《庭训格言》页六。

③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八十五，页九、十。

④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三，页十八。



“不知塞外地虽空旷,亦有水草不能相兼者。若有草无水,虽欲驻牧于此,其势断有所不能。是知毡庐毳幕,常有不定之形,而其实则不越乎平日所居之故址也。”由此,他得出结论:“塞外情形不可臆度,必亲履其境然后能知之。”^①他对“囊萤读书”之说产生怀疑,便取萤火虫百枚试验,竟不能辨字画。也有的记载似乎荒谬,而实有其事。如汉代东方朔记:北方有层冰千尺,冬夏不消。康熙帝经向俄罗斯使者询问后,证明确实如此。

康熙对最为景仰的圣人,有时称颂为“生而知之”,但并不否认他们仍需要不断地学习提高。因为圣人也不是什么都懂,“有所可知者,亦有所不可知者”,所以“犹必学而取诸人者,不敢自信”^②。他沿袭孔子《论语·季氏篇》的说法,将人分成生知、学知、困知三等,但并不否认“学知”、“困知”者经过努力学习,可以达到较高境界,即“未有不学既久而不可上达者”。同样,“生知”之人如果要想取得成功,也必须与普通人一样,循序渐进,孜孜不倦地学习。因为“功夫固不可躐等而进,尤不可半途而止”,否则便会“功亏一篑”^③。他概括人的识见有三种:一为平日胸有成竹,“不待拟议而后得之”的“素定之识”;二为事变突然,未能骤断,“必待深思而后得之”的“徐出之识”;三为虽有深思而不能得,必“合众人之心思”,“择其是而用之”的“取资之识”。认为“此三者,虽圣人亦然”。即使尧舜也认为需要征求群众意见,集中群众智慧。“能取于众,所以

① 《康熙几暇格物编》上之下,《蒙古居处有定》。

② 《清圣祖御制文一集》卷十八,页六。

③ 《清圣祖御制文一集》卷二十六,页三。



为圣人耳。”^①他在一篇论文中写道：“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②借用圣人之言，否定生而知之的可能性。所以，他在晚年告诫子孙说：“人之为圣贤者，非生而然也，盖有积累之功焉。由有恒而至于善人，由善人而至于君子，由君子而至于圣人。阶次之分，视乎学力之浅深。”^③更强调人的主观努力在其一生成长中之作用。

认识来源于多方面，即儒家所谓“穷理非一端，所得非一处。或在读书上得之，或在讲论上得之，或在思虑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读书得之虽多，讲论得之尤速，思虑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实”。他以长期的切身体验，认为“此语极为切当，有志于格物致知之学者，其宜知之”^④。其中，他更重视实践，在实践中研究、思考，汲取新的知识，在实践中验证书本知识是否正确。

既然认识依赖于客观实际，如果客观变化，主观认识亦必随之改变。于是康熙又形成时移势殊发展变化的观点。在治河问题上，表现最为明显，他说：“前代治河，皆以为宜疏决而放之海，则永无河患。但今运道，自淮以北，必由黄河一百八十里，而后达于运河”，需要蓄水济运，“与古形势不同，则古说亦何可尽行也？”^⑤再如，汉高祖之待韩信，不能如汉光武、宋太祖之待功臣者，也是由于“时势不同”。因而指出：“光武、宋祖之时，功臣归于京师，无握兵之权，无震主之势，故保全之尚

① 《庭训格言》页三十一。

② 《清圣祖御制文一集》卷二十一，页十五《信古解》。

③ 《庭训格言》页十五。

④ 《庭训格言》页六十五。

⑤ 《清圣祖御制文一集》卷二十六，页二。



易;韩信居楚,兵柄在握,天下初平,人心未定,高帝收之,亦非得已。总由所遇之时不同,故所行亦各异耳。”^①用此道理说明,对“三藩”不能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策。

他还力求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在好恶、成败、安危等诸种矛盾中,注意掌握分寸,防止偏颇。他说:人于好恶之心难得其正。我所喜之人,惟见其善,而不见其恶;若所恶之人,惟见其恶,而不见其善。是故《大学》有云:“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善者,天下鲜矣。”诚至言也。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是任何统治者极当注意之事。一次讲官进讲:“骄心一生,何所不至,故圣人急急惕之以忧,以为安者危之伏也,治者乱之机也。”康熙听后体会道:“这所发明极是。满招损,谦受益,圣人久安长治之道,只在持满而已。”^②他还说:“凡人于无事之时,常如有事,而防范其未然,则自然事不生;若有事之时,却如无事,以定其虑,则其事亦自然消灭矣。”^③此论有如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④颇有一些辩证因素。

康熙始终以救世主自居,但与有些帝王相比,他不尚虚荣,不求浮华,对自己的认识比较接近于实际。他在取得巨大成就之后,仍能看到自己的不足,拒绝过分颂扬。他经常自我反省,并公开自责。康熙四十三年(1704),他回顾四十余年孜孜求治,仍有许多事未做好,自责说:“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

① 《清圣祖御制文一集》卷二十七,页十五。

② 《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056页。

③ 《庭训格言》页二十三。

④ 老子:《道德经》五十八章。



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①康熙见内阁所拟谕旨，有“海宇升平”等语，认为言过其实，指出：“今海内虽定，民生未尽悦安。……若遽谓升平，则泰然自足，无勤求上理之心，非朕意也。嗣后谕旨，此等夸张盈满语，勿复拟入。”^②凡见章奏内有“德迈二帝，功过三王”，“道备君师，功过覆载”等语，即及时传谕批评，令其改正。他说：“一切颂扬之文，俱属无益。朕见近来颂圣之语殊多，表策内亦以此等语铺张凑数，悉应停止。”^③

自康熙二十年冬至六十一年康熙去世，凡国家取得重大胜利，或逢皇帝五十、六十大寿、执政五十、六十周年等喜庆之日，诸王、贝勒、满汉大臣、蒙古王公及达赖喇嘛等，纷纷请上尊号，达十余次。康熙一概拒绝，反复说：“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天下共享太平之福，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如一切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今吏鲜洁清之效，民无康阜之休，君臣之间全无功绩可纪，倘复上朕尊号，加尔等官秩，则徒有负愧，何尊荣之有？”^④康熙六十年三月初四，为庆贺他御极六十周年，诸王、贝勒、满汉大臣、文武百官上疏吹捧，恭上二十字尊号：“圣神文武钦明濬哲大孝弘仁体元寿世至圣皇帝”。字数最多，康熙批驳也最尖锐。他说：“从来所上尊号，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此乃历代相沿陋习，特以欺诳不学之人主，以为尊称，其实何

① 《清圣祖实录》第218卷，第12页。

② 《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403页。

③ 《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160页。

④ 《清圣祖实录》第99卷，第10、11页。



尊之有?”“且现今西陲用兵,外则官兵披坚执锐,冒暑冲寒,劳苦已久;内则民人负重跋涉,挽运远道,力亦疲困;兼之被灾之处,民多受累。”念及于此,惟当修省图治,加惠黎民,“有何庆贺?”又指出,“微贱无耻之徒,谓举行庆典,必有殊恩,邀望非分”,更有人以为六十年庆典必行宽大,故杀故犯。因而决定:“凡诏赦恩赉等项,概行停止。这所奏庆贺无益,不准行。”^①康熙拒绝上尊号,始终一贯,直至晚年,表明他的明智和求实精神。

三、“明理之后,又须实行”

关于学与用、知与行的关系,康熙主张读书穷理,讲求治道,学以致用,身体力行。有一次,康熙听讲《中庸》之后,问讲官知行二者哪一个更加重要。讲官叶方蔼以两可之言回答:“宋臣朱熹之说,以次序言,则知先而行后;以功夫言,则知轻而行重。”康熙则十分肯定地说:“毕竟行重,若不能行,则知亦空知。”^②为什么说行重?关键是学与知的目的在于应用,在于指导行动;若不用、不行,学与知便失去其价值。所以读书,要学以致用:“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有益于所学。”^③他在读书笔记中写道:“人主万几待理,自当博览载籍,扩充闻见。然所贵者,在于上下古今得其要领,辨别是非归于至当,使天下之人情物理,靡

① 《清圣祖实录》第291卷,第17、18页。

② 《国朝先正事略》卷六,《叶文敏公事略》。

③ 《康熙政要》卷一,页七。



不洞悉其隐微,熟识其常变,因以措诸施行,期为有益,岂如士庶之学,仅娴习词章而已哉!”^①他以自己处理学与用、知与行的关系的体会说:“明理最是紧要。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措施。故明理之后,又须实行。不行,徒空谈耳!”^②

当时理学名臣大多空谈废业,坐而论道,理论脱离实际,与康熙的学用一致、知行统一的观点大相径庭。由于理学家言行脱节,又引起康熙提出理学真伪问题。他对讲官张玉书等人说:“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即真理学也。”^③举著名清官已故两江总督于成龙为例,说:“理学无取空言,如于成龙不言理学,而服官至廉,斯即理学之真者也。”^④他一再批评汉官说:“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今视汉官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⑤为什么言行不符?康熙认为这都是私心作怪,所以指出:“人品辨别,只在心术公私。凡人口之所言,与身之所行,往往不相符合,故去私最难也。”^⑥又说:“作文者,无不论理,然徒能言而不能行,亦奚益哉!朕观性理一书,大指只一诚字,人可不以诚自勉乎?”“有学问而无人品,其所学亦何足道哉!”^⑦因此,主张以

① 《清圣祖御制文二集》卷三十八,页十。

②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116页。

③ 《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089页。

④ 《国朝先正事略》卷七,《于清端公事略》。

⑤ 《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194页。

⑥ 《清圣祖实录》卷八十八,页二十二、二十三。

⑦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四,页十四;卷二百三十九,页十三。

